

普列斯論

盧波爾芬著
壽慈譯



白虹書店發行

普式庚論

I盧波爾等著
莊壽慈譯

普式庚論

莊壽慈譯

白立書

大光明書局

白虹書店發行

普式庚論

每冊實價二十元
外埠酌加寄費

著者 盧波爾等著

譯者 莊壽慈

發行者 白虹書店

印刷者 大成印書館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三月初版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目錄

普式庚的偉大.....	L. 盧波爾教授 (一二)
孤獨的普式庚.....	馬卜拉果奧教授 (三四)
現代俄國文學之父.....	I. 萊茲維夫教授 (四三)
高爾基論普式庚.....	S. 巴羅哈地教授 (五三)
論「歌根·奧尼金」.....	A. 古爾斯坦 (七一)
普式庚的抒情詩.....	L. 鉄摩非葉夫教授 (八九)
普式庚的敘事詩.....	M 克拉甫欽珂教授 (九八)
普式庚的散文.....	V. 希克勞夫斯基教授 (一二六)
作爲劇作家的普式庚.....	E. 維諾古爾 (一四三)

普式庚與民間文學

M · 阿查朵夫斯基教授 (二五九)

普式庚與國歐文學

V · 查爾蒙斯基教授 (二七〇)

後記

(一九八)

普式庚的偉大

〔盧波爾教授〕

(一)

普式庚創造了俄國的文學語言，是現代俄國文學的建立者，而且以他不朽的作品使人類格外豐富起來。

普式庚的名字不但與文學不可分離的結合着，而且也和全部的俄國文化結合着，這文化，是偉大的俄國人民在和嚴酷的自然，以及和造成俄國歷史的社會關係之同樣嚴酷的體制奮鬥中建立起來的。

白林斯基論『歐模·奧尼金』時說，這是一部民族的作品，因為它代表了『俄國生活的百科全書。』我們今天可以說，普式庚的作品構成了一部民族生活和民族意識的藝術的百科全書。

雖說普式庚的時代已經過去久遠了，他的作品却活着，誠如普式庚自己活着，如果可以說一個人能够永遠活着的話，——在後代人的記憶裏一樣。

普式庚乃是他那時代的產物，那是一個殘暴，專制，農奴制度的時代。那是『遊歷的暴君』亞歷山大一世和尼古拉·巴爾金（註一）的時代，用普式庚的一個同代人公正的按語來說，即是

一個『說話既危險，沈默也不祥』的時代。

除去教會的學院之外，是不准許研究哲學的，按照官方的主張說理由很簡單，即是『哲學的好處還沒有得到，也許先就產生了可能的禍害。』剩下的只有文學和藝術的範圍了。這一時期嚴遭檢查的文學，它的進程受着檢查官阻礙，不斷地在憲兵的監視之下，依然是民族意識初次得着藝術表現的範圍，這一進程的主要任務乃是普式庚的天才所負起來的。一八二三年，他非常之正確地描寫他自己道：

一個孤獨的播種自由的人。

我早早地走出我的寓所，當那羣星還未出來，

於是我用滑白無污的手，把給與生命的種子

散播在被束縛的犁畦裏。

俄國的民族意識在反對封建專制制度的鬥爭中表現了出來，而在反對布爾喬亞和地主統治的鬥爭中集中了力量。

普式庚的時代使他面對着兩個基本政治問題：即關於專制政治究應怎樣，關於農奴制究應

怎樣。普式庚以其詩人的直覺理解了這些問題的眞諦，而且在他的作品中指出了正確的結論。

普式庚夢想着——不但是夢想着，而且是深信着——總有一天專制政治會消滅，而且就因這條故，他的名字將永不會爲人所忘。一八一八年他寫信給卡達也夫（註二）這樣寫道：

同志，請相信：快樂之星將躍現，

在我們的眼前，一個燦爛的表徵，

俄羅斯將從她的長眠中蘇醒，

而且在專制制度的廢墟上，

還將深深地銘刻着我們的姓名。

普式庚曾繪下了一幅農奴制度之下的悽慘的農村之圖。

不管眼淚與呻吟，

命定了要毀滅人民的，

野蠻的地主們，用殘暴字橫的統治，

用皮鞋和鞭杖，強佔

農民的勞動財產和時間，

形容枯槁的奴隸，忍受着皮鞭，

辛苦地操着不是他們自己的犁，

耕種着他殘暴的主人的田地，

這兒他們要背負苦輓直到死，

一切的希望與柔情盡息在他們的胸裏，

這兒妙齡少女發育而且美麗如花，

爲着無情的流氓的恣情放肆。

不管普式庚在他一生之不同的時期中他的戰術如何——他一直把專制政治和農奴制度看做是戰鬥的敵人，就是爲着和它們奮鬥，他才喪了性命的。

普式庚是具有革命思想的貴族們「光榮的一羣」中的一個，這些貴族們，和專制政治與農奴制度進行着不能勝任的鬥爭。他是十二月黨人的替人，是一個有着大胆的幻想的人。這使他超過

了他的時代與他的階級。

在年代上他是屬於他所生活的那個時代，可是精神上他却屬於將來。他說他自己道：「我是未來世代的一個公民。」他，那時代一切矛盾的詩歌之中心，當然有時與他自己相抵觸的。但是貫穿着一切矛盾的乃是一種確實的一致，乃是一條引向我們自己的時代，引向我們自身的線。

普式庚反對專制政治，反對農奴制度，但是他也反對他那時候的中間階級的俗物。他沒有親見到革命的知識份子的出現，更沒有看到革命的工人階級的興起。

用不到去想像，如果他活著見到他們出現時，他將如何。我們只要知道他在那時代是如何的一個人，以及因那些地方才被尊為一個詩人，這就夠了。

當時的政治叛徒們，帶有革命傾向的貴族們，正如伊里奇明白地指出，是「非常脫離民衆的。」詩人普式庚却接近民衆，因為他是由于他的民衆們產生出來的。

民族意識的深化以及由此而掀起的鬥爭，與俄羅斯人民的鬥爭迴應着，主要的表明了深切地確認人類的個性，確認個人的性格。

即雖在少年時期，普式庚和那些「只爲自己要求自由」的人就不相來往。他底人格的觀念並不是個人的，主觀的觀念，而是一個整個人民，整個民族的人格的概念。他對於你爲一個真實價

值的人性的看法同樣地也不是非健全的個人主義的表現，而是對他每一個同胞的個性的看法。

這種直到那時俄國文學上還未見過的普式庚的人格觀，這種普式庚的人道主義，即雖到現在，在歷史的遠景中，還有其鉅大的意義，雖然也許還未充分地評價過。

西歐各民族曾經歷過諸如通常所曉得的中世紀和文藝復興這些歷史上著名的時期。昂格斯正確地說過，文藝復興的鉅子，不管如何說法，都不是思想褊狹的資產階級。他們以他們自身活生生的人的理想，反對中世紀的理想——聖徒和苦行主義者，——悸動着生機，他們並沒有違反什麼人性。他們以人性的本身，以他個人尊嚴的矜矜反對那淹沒人性的天主教派的教會主義，他們以活潑的自然與人類的經驗反對那呆板的煩瑣哲學的學術，他們以生命的現實主義，反對那傳統的教會藝術。這個表示出封建意識之瓦解的過程，在歐洲不過是在十五到十七世紀才開始，而在普式庚時代達到了它的頂點。我們一想到這一時期便聯想到意大利的但丁，佩脫拉克，（註三）和薄加邱，法國的拉柏雷，（註四）莫里哀和伏爾泰，英國的莎士比亞和拜倫，德國的萊辛，（註五）歌德，席勒和海涅。但是這一過程，歐洲却要四百年的工夫。

在法國，伏爾泰之前有通俗的古詩體的短篇小說，有拉柏雷和蒙且（註六）。在我國，普式庚之前則有我們的民間文學，有我們的羅蒙洛索夫（註七）和拉狄希契夫（註八）。可是，歐洲在

四百年中所互歷的路程，我們只須幾十年，而在普式庚本人僅僅二十年就經歷了。誠然，普式庚以其對自然的愛好，以其對人類的，人性的，人格的敏銳的覺悟，普式庚以其人道主義和現實主義，他本身就是我們的文藝復興。普式庚在他二十年的創作活動中，趕上了歐洲文學，使得俄國文學成爲了世界文學的一部分。

普式庚乃是我們的伏爾泰，我們的莎士比亞，我們的歌德，因爲普式庚吸收了世界的文學，從中生活而且受苦過來，並且創造了嶄新的俄國文學，世界文學附屬的一部份，他成爲了世界的詩人。

這個人現在還以他聰慧的，敏銳的眼注視着我們。我們感覺到這一注視，而且我們在這注視中覺得榮耀。我們對他說：『你的話，

「那兒，環繞於墓塚的門口

讓年輕的生命自由地歡樂，」是實現了。在偉大的俄國詩人的墓前，年青的幸福的蘇維埃的生命在歡樂着。」

(11)

我們想扼要地敘述一下這位詩人與他政治生活緊相聯繫着的創作之路，雖然他底文學作品並

非但政治活動的副產物，然而普式庚常常給政府造成了重大的政治問題却並非不重要的。正如他自己所說，『每個自由的字，每一篇違禁的文章』都談諸他的身上。要不是這樣，沙皇也不會從他二十歲直到他死，一再地將他置於政治的放逐之中了，也不會將他置於憲兵不斷地監視之下了。

普式庚底童年及少年時期，適值一個殘酷的反動時期。

亞歷山大一世統治的初期所作的慷慨的允諾翻悔了，這乃是宜稱加強農奴制的壓迫。

在一八一二年拿破崙的失敗以及他接着來的崩潰以後，專制政治和農奴制度的國土俄羅斯，遂變成了歐洲的憲兵。國內的阿拉克契也夫（註九）統治顯出了放肆的反動。

奴隸剝削的加緊不但引起了農民的叛亂，而且在貴族中間，引起了革命運動，尤其是那些在軍隊中，曾經參加過反抗拿破崙戰事的，而且會到外國的貴族們，表現於政治結社的這一運動，結果造成了一八二五年的十二月革命。

當然，構成普式庚童年時最初印象的，以及構成可說是他將來創作活動之基礎的，並不是這些政治事件。他感受到它們的衝擊還要晚些，是在皇村書院（註十）的時候。這位詩人創作靈感的第一個泉源，乃是從他的保姆阿利娜，魯荻奧若夫娜那兒聽來的民間故事和在他父親書齋中

所讀到的法文書籍。

當他才開始能够自己讀書的時候，年輕的普式庚對於法國抒情詩的阿拉克里溫（註十一）的風就喜歡。帕爾尼，格利色特（Gresset）葛萊口特（Glecoart）拉·芳騰（註十二）都是三個智慧早開的孩童所喜愛的作家。這就是扶植了這位未來詩人的想像的滋養料。關於想像，他在十五歲孩童的時候曾寫道：『想像呵，只有你才是我的賞賜！』

普式庚詩的前途分明是在那時候奠定的。

普式庚在皇村書院的幾年乃是他作爲一個詩人的學徒期，這是毫不足怪的，而該時期的法國文學首先比保姆的民間故事得佔優勢，這也是毫不足怪的。

戀愛，友誼，醇酒，一如幸福之陳列所與同義語，潤飾着普式庚在學生時代所寫的詩歌。稍後一種新的思潮才出現在他的創作裏。

一七八九年法國大革命的思想，即當時革命的布爾喬亞的思想，在哲學上都有了明確的概念與想像。反暴政與宗教任的鬥爭寓含着反專制主義與封建主義統治的鬥爭，以及反宗教意識和致會的鬥爭。這些同時又寓含在反奴役和頑固的鬥爭的號召之中。代替它們的乃是一種對自由，平等和法律的要求，這是人類社會的最高法律，「自然權」的結果。皇村書院一位年青的教授庫店

津所宣傳的這些思想，由於自由主義和革命主義而引動了普式庚。

普式庚底政治抒情詩之早期的主題，因為他與卡爾達也夫和察爾斯柯·塞洛（Tarskoye Cel）普式庚幼年求學的所在地（駐防軍中思想急進的軍官們交遊的緣故而變為有力的了。他們的影響使普式庚還是一個學生的時候就變成專制政治和農奴制度的政治敵手了。

這些主題在他的「自由頌」中達到了真正革命的頂點，這首詩表現了自然權利之革命傳統的「一切的因素：反對暴政與宗教狂，反對奴隸制，要求自由和立憲的政府。」

「自由頌」（一八一七年）這首詩，乃是十八世紀法國革命的思想影響於普式庚的登峯造極的產物，同時，這種思想具體化而且應用於專制封建的俄國這一過程之成熟的開始，也光輝地表現於他一八一九所寫的「鄉村」（Village）中。

俄國文學直到那時從未見過這樣的政治世態畫，然而在普式庚，這種世態畫對於他底詩的發展之基本路線並非偶然，毋寧說是這一發展不可缺的源泉。

由「阿查瑪斯」（註十三）及其對「斯拉夫俄文詩學」的文學上的鬥爭，轉變為與十二月黨人活動有關係的「綠燈社」之一員，這是非常自然的。

普式庚在這時候寫了樸實的，但是憤激的「鄉村」和驚心奪魄的「露斯蘭和羅德密娜」，在

這作品裏，他摸索着『往日的事實和遠古的故事』，而且，自己大胆地打破了舊的詩歌傳統。

普式庚顯然地逃不脫沙皇憲兵的注意：一八二〇年他被放逐到南俄，從那時候起直到他死為止，他一直是在警察的監視之下。

過去，忠於沙皇的文學史家們都堅說詩人之寄寓南俄是非常有益的。他不是看到了克里米，高加索，海洋，和南方的天空嗎？我們卻要問問這些歷史家們，普式庚為什麼不能在政治的放逐之外來看這些大自然的美麗呢？

但是，普式庚的放逐生活並沒有摧毀他的精神，倒反使它格外堅定了。在放逐中他寫了『高加索的俘虜』『巴赫齊薩拉之淚泉』，並着手寫『歐根·奧尼金』，而且已經起了『吉卜西人』的腹稿。他的閱歷有時令人想起拜倫底主人公的閱歷，但是把這一時期的普式庚本人看做是拜倫的俄國門徒，却是不可恕的錯誤。在那幾年當中，普式庚常常吸收他那時代的學識，而且探討西歐文學，有時亦許俄國的實況和俄國歷史的某些特點會引起他某種拜倫風的觀念和聯想，這是不足為怪的。

要想在普式庚所謂『拜倫風的詩歌』的人物中找到這位俄國詩人自己，同樣也是沒有根據的。『高加索的俘虜』，這一時的『遁世者』和幻想的『自然之友』，老早就『失去了他的熱念逸

樂』而且充滿了『悲思』。阿樂哥（Aleko『吉卜西人』中的主公）只渴求他自己的自由，所以當雷丙也夫勸告他將阿樂哥『至少寫成一個鐵匠』的時候，而普式庚寫信給他道：『把他寫成一個八等文官，或是一個地主才好哩』，這不是沒有道理的了。

普式庚事實上，而且他自己也以爲，是『誹謗和存心報復的不學之徒們的犧牲品』，並且還絕不能把自己寫成：『沒有熱狂與希望，我憔悴了，一個熱情的犧牲者』。他的希望，他的熱狂，在這時期的這幾行詩：『但是不，我們將在幸福中快樂融融，我們將從一盞血杯共享聖餐，』以及他在卡曼喀（註十四）和他十二月黨的友人們的會晤中最是表現得清楚。

普式庚底自由主義者的情感在南俄放逐的期間才強固起來，就是因爲這個緣故，政府這才覺得他不大妥當。一八一四年，我們見到詩人在國內一個新的而且更其離得遠的放逐地寫信結雅遮訶夫（Yazykov）道：

『命運有意作惡地戲弄我。我毫無庇護地流浪了這許多時候，無論我到了那裏，都讓專橫的人來擾亂我。我沉睡着，不知到何處才會醒來。永遠被迫害着，我確是像一個亡命者似地捱過我不自由的日子。』

普式庚之傾心於基於通俗經驗的文學，在他被迫寄居在南方的時候就已經明顯。在密開羅夫